

确认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性

达巍

内容提要 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链条。中美两国在三者关系上存在着不同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和经过理论及方法训练的政策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需要进一步强调学术独立性、研究方法、学科专业化,以及政、商、学、媒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政策研究 学术研究 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

2009年4月,美国政治学家、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职的约瑟夫·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学者靠边站》,^①再次提到一个学术界经常讨论的问题: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家政策实践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现象。^②无独有偶,中国学术界也常有学术、政策“两张皮”之说。不过,中美两国面临的是同一问题吗?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者,笔者将从政策研究的学术性入手,探讨政府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三者关系,从而寻找“两张皮”的“脱节”之处,并提出对提高中国国际问题政策研究质量的看法。

*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81)

**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中心举办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青年学者论坛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感谢北大国际战略中心及余万里先生提供相关材料;感谢青年论坛与会者的精彩发言及对笔者观点的讨论。

① Joseph S. Nye Jr., “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9, A15.

② 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5. Vol. 8, pp. 23-48. Andrew D. Marble, et al.,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Policy Worlds”, *Asia Policy*, No. 1, January 2006, pp. 1-41.

一、政策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

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以国际行为体当前或未来对外行为、政策、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从事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三大块:一是党、政、军相关单位研究部门或下属研究机构;二是社会科学院“国际片”;三是高校相关专业及附属研究机构中的一些学者。这些研究者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均以为政府决策服务或影响决策为研究目的,很多机构和个人拥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政策的渠道。此外,一些大型企业、国际组织设有自己的研究部门,或委托其他单位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这些研究仍以国家对外政策、战略为研究对象,但直接服务对象不是国家决策者,而是本企业或机构。再者,近年来中国以国际事务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媒体迅速增多,^①对社会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日渐上升。这些报道、分析和评论并非正式学术研究成果,但是其背后未必没有严谨的研究过程,其作者也常常是政策研究专业人员,因而也可以说是与政策研究有密切关系。

在中文中,政策研究常常被用来与学术研究相对。^②这样的用法隐含着一个观点,即政策研究不是学术研究。这一划分似乎对应着约瑟夫·奈在《学者靠边站》一文当中的划分:“学术”(academics)与“政策”(policy)。在此,“学术的”与英文 academic 被等同起来。实际上,英文 academia 一词源于希腊语 akadēmeia,亦即柏拉图的学园。柏拉图《国家篇》当中有关洞穴的比喻,正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本体”与“现象”对立的二元知识论的体现。柏拉图及其弟子在学园中追寻永恒的真实存在、真正的知识,亦即“相”(form 或 idea);至于我们感觉到的具体事物变幻无常,并非真正的知识。这种对“相”的追寻投射在今天西方大学内部“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因此,academic 对应为“学院的”,也许更为妥帖。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主要关注国际行为体对外行为,正是柏拉图所谓虚幻“洞穴里的投影”,可以肯定不是“学院派”研究。

政策研究不是“学院派”研究,却仍然可能是“学术”研究。“学术”一词在汉语中被定义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这一界定过为宽泛,对探讨政策研究的意义不大。由于“科学研究”比“学术研究”语义范围更小、定义更精确,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科学性来确定其学术性。

英国统计学家、科学哲学家卡尔·皮尔逊有关“科学的本质在于研究方法而不在于研究内容”的观点被“科学派”广泛接受:“科学的领域是无限的;其材料是

^① 中国近年来政策研究的这一“市场”发展极快。仅在北京地区,专以国际事务为报道对象的报纸就有《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世界新闻报》、《青年参考》等。感谢王文介绍相关情况。

^② 如本次青年学者论坛的主题即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

无尽的;每一组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阶段,过去与当前发展的每一个舞台,这些都是科学的材料。把各类科学统摄起来的只有方法,而不是材料。”^①也就是说,决定政策研究是否是科学研究的,不是政策研究的对象是柏拉图的“火”还是“投影”,而是研究方法。

美国学者加里·金、基欧汉等列举了的科学研究的四个特征:^②(1) 研究目标是推理。国际问题政策研究是从现有知识出发,抵达之前我们未观察认识到的现象、知识。这其中一是描述性推理,从已经观察到现象推理未知的现象。例如研究者从2003年到2007年1月美国在伊拉克所遭遇的困难、2007年1月向伊拉克增兵之后情况有所好转这一现象,推测奥巴马政府将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推行的战略。二是因果性推理,例如研究者从奥巴马上台以来美朝互动情况、朝鲜国内政局发展或者朝鲜的“强盛大国”梦想,解释朝鲜2009年5月第二次核试验动机。(2) 研究程序公开。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者“或多或少地观察现象、提出问题、从观察到的事物推理出有关世界的信息、对原因和结果做出推理。”^③在此,关键的要点是“公开”,即研究过程、逻辑是可供他人讨论的。国际问题政策研究显然符合这一标准。与其他学科一样,政策研究的资料搜集是否全面、平衡,逻辑是否顺畅完整,都是学科内部被讨论的问题。(3) 结论不确定。之所以不确定,在于科学研究有其范围。中外政策研究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大陆是否会对台湾动武、2003年伊拉克战争进程等问题上,都有不少判断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学术界也越来越接受这些不确定性,更多地将其视为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局限,甚至是研究者坚持科学方法而必然付出的代价,而非研究者本人的错误。(4) 内容取决于方法。即科学研究遵循一套推理的规则,其有效性也取决于这套规则。金等人归纳的提出问题、运用理论、收集资料、使用资料等程序,在政策研究领域完全适用。^④因此,从理性主义角度来审视政策研究,政策研究是科学研究,因而也是学术研究。^⑤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有“科学”与“人文”之争。上述“科学派”的观点目前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居于优势地位。实际上,国际问题政策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历史研究与国别区域研究。这些研究领域较之国际关系具有更强的“人文”特

① Karl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892, p. 16.

②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7-9.

③ Ibid.

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每五年推出的全球趋势报告是观察政策研究方法的一个很好案例。NIC2020报告介绍了其研究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方法。见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December 2004, p. 19-23.

⑤ 相关中文讨论参见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15、156—159页。

性,更多地以诠释方法来看问题,从国别、个案等个体视角入手,去理解和解释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具体政策和战略。“先对社会行动进行移情式的理解,然后再付诸语境和意义网络去理解这种行动。之后,再将这种特殊的事物融入更为广阔的客观世界中。”^①虽然政策研究并不具有人文研究的反思特征,没有将通过理解而获知的意义普遍化的任务,但是其对诠释方法的运用,使其具有了人文研究的学术性。

实际上,无论国际问题研究是科学、人文,还是两者的契合,构成其学术性的根本是专门的研究规程、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研究的学术性是确定无疑的。

二、“脱节”在哪里?

如果政策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就不能把约瑟夫·奈提出的问题归结为学术性与政策性的脱节。在美国,以智库为代表的政策研究界与政府决策之间的互动十分密切。智库与影响政府政策的传统渠道依然畅通。^②例如,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旋转门”仍一如既往地运转。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交接之际,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杰夫·贝德(Jeff Bader)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卸任的高级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则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担任高级研究员,两人“交换办公室”,可说是旋转门的最新体现。小型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号称几乎“全体进入政府”。中心两位创办人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科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及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与此同时,智库人员参与总统大选团队的传统没有变化,除贝德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首席亚洲事务顾问外,坎贝尔曾帮助希拉里竞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德里克·米德伟(Derek Mitchell)很早即参与奥巴马竞选,并于选后进入国防部。此外,近年来美国智库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鼓吹”性,与非政府组织、媒体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制造议题、设定议程的能力强化。这种趋势扩大了智库影响广义决策过程的能力,当然同时也对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及研究质量构成威胁。

约瑟夫·奈在其文章中将“美国1200家智库”列为“学院派”的竞争对手。可见,在奈眼中,与政府决策脱节的主要不是政策研究,而是“学院派”研究,特别是其理论研究和理论化倾向。奈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奠基者之一,也是“软实力”等概念的提出者。奈的批判针对的是他最熟悉的领域,是美国政治学“以数学模型、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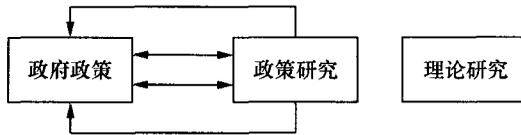
^① 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9页。

^② 袁鹏、傅梦孜主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3页。

方法论、新理论、学术术语”越筑越高的“象牙塔高墙”。^① 国际问题研究在大学内大致包括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区域研究、外交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专业。这些方面的研究当然并不止于理论研究,有相当多知识积累的成分,并不涉及理论化过程,尤其是在区域研究领域。但是,理论的创建与完善确实是学院研究的核心,也被赋予最高价值。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用政府政策、政策(导向的)研究、理论(导向的)研究“三分法”来审视奈所提出的学术与政策的关系问题。

如奈和沃尔特所指出,美国理论与政策研究两个圈子彼此轻视现象严重,人员交流不多。在政府长期任职或在智库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没有机会跨越学术“门槛”,再进入大学。大学里的学者也鲜有愿意进入智库工作者。这种现象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政策研究缺乏最新理论研究支撑。大多数政策研究者只是在政策研究、政府、媒体、私营部门之间流动。这一现象与前文所述的美国智库越来越多地具有“鼓吹”型特征是否有因果联系尚待观察;二是一些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沦为没有相关性的研究。现将美国政策研究、理论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对外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三者关系:美国状态^②



同样用政府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这样的划分来审视我国的政策与学术关系,会发现中国面临着与美国明显不同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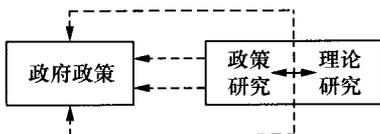
一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相关专业的理论化及理论与研究与美国同行相比差距极大。以国际关系为例,除了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贡献之外,国际关系理论常被认为是“美国学科”,三大理论均产生于美国。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虽经千呼万唤,但始终未能成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及根据本土经验的批评与消化。另一方面,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政策研究领域研究机构和人员数量少,研究质量不高,参与决策咨询的机会不多,机制化不够。政策研究者通过对媒体发声,引起政府决策者注意也不过是在最近几年刚刚出现。不过,较美国学术界稍好的情况是,在学术界内部,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并无特别深的鸿沟。一些学者同时兼跨理论与政策研究,两类研究学者的互动交流也比较自然,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圈子。这或许是因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

^① Joseph Nye, Jr., “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9, A15.

^② 双向横箭头为政府政策与政策研究界直接的双向互动;外围单向折线箭头为政策研究界通过对社会发生而间接影响决策。

不够发达、“门槛”不高所致,但是客观上也有其积极意义。中国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如表-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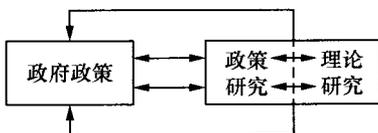
表-2 对外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三者关系:中国状态^①



三、一种理想状态?

针对中美两国的上述问题,或许可以通过解决问题来提出一个“理想的”政府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三者关系。一方面,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属于统一的国际问题研究范畴,两者虽有侧重和分工,但是存在一定的知识和人员交换。另一方面,政策研究与政府决策有密切、机制化的联系。如表-3 所示。

表-3 对外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三者关系:理想状态



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三者关系的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理论研究可以影响政策研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这种影响反应在宏观层次的大理论及中观层次的外交政策分析上。在宏观层次,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给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提供了三种世界观。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越来越多地主张在多边制度的基础上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②这一趋势体现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影响。亦有学者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指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正在使中国的国家身份认同从一个革命性国家向一个现状性国家转化,并由此导致中国战略文化的再建构及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③与此同时,一些中观层次的理论特别是外交政策理论,如威慑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决策理论,则可以

^① 虚线箭头表示政策研究界对政府政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仍然较弱。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两个方框较表-1 较小,表示中国政策研究、理论研究都还不够发达。但是两个方框以虚线相连,并有双向箭头连接,表示中国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互动较多。

^② 苏长河:《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4 期,第 11—16 页。

^③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 期,第 10—15 页。

直接为具体的国家对外政策决策服务。^①

第二,现实政治及政府决策者面临的问题可以反向渗透到学术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研究起点。事实上,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在试图回答美欧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时产生的。经典现实主义因理想主义无法回答两次大战间严酷的国际政治现实而产生;自由制度主义以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及美苏“缓和”为背景;结构现实主义在冷战期间美苏两极格局下应运而生;而现实主义在解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时的无力,推动了冷战后一大批新兴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中国有自己独特历史文化和发展经验。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和政治土壤这一事实,有助于中国学术界在解决自己本土问题的过程中做出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和平崛起”、“和谐世界”作了不少研究。虽然这些问题的提出主要是“自上而下”来自政府高层,但是却契合“解决本土问题”的努力方向。经过理论和方法训练的政策研究,与以本土问题为关切重点的理论研究密切结合,应该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②

第三,学术研究(包括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或宽或窄的鸿沟是正常现象。在强调学术研究与政府政策之间应存在密切互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隔是一个正常现象。对外政策的决策是政治决策的一部分,而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既有如研究者一样理性思考的成分,也存在待决策问题本身之外的政治考虑,还要受到决策者所属小团体甚至个人的战略文化、信仰、信念的影响。因此,决策并不是一个全然理性的过程。政治不等于政治学,好的政治家也很少出身自政治科学家。作为政治和政治学的一部分,国家政策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关系亦复如是。

四、提高中国政策研究质量的路径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在全球、地区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的作用,经济总量即将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企业和公民活跃在世界各个角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政策研究质量,尚未达到与经济、政治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程度;政策研究覆盖的范围,尚未跟上公民和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以下简要讨论几个当前影响我国国际问题政策研究质量的问题。

① 参见于铁军在本次论坛的发言《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② 当然,完全不以本土现实问题为研究起点的理论研究、“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仍然应该被允许和鼓励。这不但是因为对理论研究现实意义,不同的人、不同时空下都有不同理解,更因为就知识积累和学科发展而言,研究意义的首要价值是学术价值,而非现实意义。

(一) 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独立性

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需要处理好与以下几种力量的关系:

第一,国家现行方针政策。由于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都从属于某一民族国家,研究成果可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对外政策,因此毋庸置疑,政策研究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但是,政策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两者并不一定矛盾。在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不应设有禁区。完善、改进甚至改变国家的方针政策,使其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本身就是政策研究的功能之一。客观地说,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学术讨论的政治氛围越来越宽松。不同意见不仅出现在内部讨论或学术会议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但是这种“思想解放”仍不到位。一个突出表现是,近年来,中国的政策研究多次出现“学者落后于官员”的情况:政策研究常常没有发挥引领政策的作用,而是跟在官方政策之后,对官方政策开创的卓有成效的外交局面加以阐释。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学者学术水平不高、创造性不强,而是因为政策研究者自我设限、不敢走在现行政策的前面。

第二,商业利益和部门利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正在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在接受盈利或非盈利机构资助、委托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的立场是否会受到委托者及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正在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不少政策研究者从属于特定的政府部门、机构,研究成果又是难免会受到本部门视角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客观性。^① 近年来,社会对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问题研究相对经济利益较少,但是类似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第三,网络民意的“政治正确”。网络民意的声音在中国正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表达,这当然是政治民主的一个积极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民的政治表达有时未必是深思熟虑的。中国网民对国际事务极为关注,也逐渐形成主流的“政治正确”,例如对特定国家的好恶,对特定对外战略手段的偏好等等。当研究者的看法与这种民意形成冲突时,研究者显然将面对一定压力。^② 由于媒体有时也迎合这部分民意,以实现市场价值最大化,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的政策研究者也面临来自媒体的诱惑与压力。

(二) 强化研究方法意识

既然政策研究的学术性在于方法,政策研究者就必须有方法意识和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尽管近年来学科内部方法意识已经大大增强,但是与一些西方国家

^① 参见江涌:《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0月9日,第33—35页。

^② 一个典型例子是2003年前后围绕“对日新思维”所引发的讨论。

相比,中国政策研究学者在这方面仍然相对较弱。方法意识薄弱的第一个直接表现是,在研究时提不出有针对性、有意义的问题。不少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一直停留在问题领域(issue)层次,例如“中美关系现状”、“美国奥巴马新政走势”,而不能将问题窄化、细化,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question)。例如“美国国防部为何单方面向媒体泄露中美舰船南海摩擦的消息?”或者“经济危机对美国模式在世界的影响力构成何种冲击?”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如何改进研究问题、如何搜集资料、如何提高资料的质量等等。

研究方法上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实地调查研究不够。对外政策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不同国家的政治立场、利益、观念均有差别,研究者常常因本位视角而产生错误认知。因此,实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除了到国外实地调研之外,对外政策的研究者常常容易忽略在国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国内国情成为行业通病。过去,中国学者长期受制于研究经费的限制,实地调研、访谈十分有限。近年来,我国各学术单位资金日渐充裕,从事扎实的实地调研日益可能。不过即使如此,由于重视不够、方法意识不强、甚至财务制度限制等原因,与国外同行相比,我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仍远远不够。^①

(三) 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及不同专业领域间的协作

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一个趋势是新的功能性议题不断出现,传统领域分工越来越细。大而化之、“万金油”式的研究已无法满足需要。以中美关系为例,由于中美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双边层次、区域层次发展到全球层次,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需要涉猎的问题从双边的经贸、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到区域性的东北亚安全、东亚合作、缅甸、苏丹、伊朗、非洲、拉美问题,再到全球层面的能源、气候、反恐、防扩散、传染病、国际组织等问题。这些研究议题涉及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区域研究、安全研究、国际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众多学科,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同时深入,因此细致分工是大势所趋。

分工的同时,也需要强调不同领域之间的互动。由于文化、单位制度、甚至城市布局^②的影响,中国从事政策研究的各单位交流有限,学者间的合作较少,不同领域“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比较严重。研究议题的扩展及交叉,让这种隔阂的弊端日显。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不了解非洲,研究非洲

^① 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在研究“中美在东南亚软实力比较”课题的过程中,走访8个国家21个城市,深度访谈75名政府官员,参加十几场学术会议。其研究成果可参见: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and U. S. Influence in Asia: A Report from the Region*,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_pdfs/1/060820-China_US_Asia.pdf.

^② 中国从事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各单位之间距离较远。相形之下,美国国际问题政策研究“高地”华盛顿是一座中型城市,其市中心面积不大,各主要智库、高校集中在步行范围之内,客观上促进了其政策研究者的交流。

的学者不了解中美关系,导致中国学者不能深入研究中美关系中的非洲或者苏丹问题。再如,研究中美政治关系的学者不了解全球气候方面的技术性问题;从事气候专业研究的学者对中美政治关系了解不够。这使两国学者在相关议题上的讨论总是难以深入。

(四) 增强政、学、商、媒之间的互动

近年来,国内相关单位越来越重视政、学、商、媒的互动。政府部门、企业委托学术机构承担研究重大课题,重大决策之前请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参与讨论。一些高校青年学者开始有机会借调到驻外使馆等外交一线工作;一些退休高官回到校园。

未来,这种官学互动的规模还应继续扩大,并且逐渐机制化。一种互动的方式是“旋转门”式的真正的人员流动。在现有做法之外,未来也可考虑请较为资深的学者到政府部门直接担任重要职务;组织中级政府官员“回炉”到政策和理论研究机构担任访问学者;将交流的范围扩大的媒体资深记者、企业研究部门等。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发挥平台功能,邀请官员、学者、媒体和企业的研究人员担任访问学者,推动政、学、商、媒之间的互动,也增强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以及学术、媒体不同单位人员之间的交流。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不过,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单位文化和用人制度,实际上过分强调模仿美国“旋转门”机制并不切合中国实际。“旋转门”的实质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人才库,也不必将其过分神话。任何一个大国,在政、学、商、媒、非政府组织等部门,都会蓄积一批政策人才。通过多层次的会议(包括中低层官员与中青年学者的互动)、共同参与学术活动、搭建经常性讨论交流平台(如通过互联网或者小型出版物)等形式,进一步加强这个共同体内部的知识流动与沟通,可能是一种更低成本、也更切合实际的办法。